

战后和解

——以德法、德波关系中的德波关系为例^①

[德] 乔格·卢尔(Jörg Lüer)

戴启秀 译

摘 要: 作者在阐述二战后德国同其邻国法国、波兰和解的案例中,重点分析了德波和解进程,并指出了这两个案例的不同性,并从历史经验与和解过程中归纳、总结了和解所需的前提及和解过程必备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 邻国和解; 德波关系; 德法关系; 和解要素

作者简介: 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 会议秘书长 德国柏林 10115

译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06)03-0007-04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会,并能在这里同大家一起讨论和解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同时我也非常高兴给各位介绍德国在同邻国的和解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并为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我们也将看到,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和解是否有它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当然,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讨论和解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些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在这里就并非自然。所以我要避免一种印象,即我们德国有一种处理和解问题的方案。我们没有这种方案,我们带给与会者的是一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在中国是

否有借鉴意义,报告后我们可以讨论。

根据此次会议议程的安排,我主要集中阐述德国与波兰的和解过程,德法和解则由另一位教授阐述。在德波和解方面,我把重点放在和解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和德波冲突的基本结构。

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和解案例是以完全不同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以德法关系为例:德国和法国在19世纪是以这两个大国争夺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为主要特征的。世仇理论往往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敌对双方的互相吸引。在这方面,德法冲突主要涉及两国的争霸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对立双方都认可对方是同等地位的敌手。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法国朋友从内心并没有将任何人看成是同

^① 本文是作者2006年3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21世纪国际和解与和平”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等地位的对手。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德两国在二战之后能成为欧洲统一的发动机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一、德国-波兰和解

德波和解个案同德法和解个案完全不一样。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的领导精英层认为波兰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地区。从历史发展来看,最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意志追求大国地位都涉及此地区。当然,在这里叙述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过程,话题就会扯得很远。就波兰本身而言,它要么是强大的,同其他欧洲大国竞争帝国地位,要么就是一个波兰民族国家。

解决波兰问题是德国追求帝国目标不可放弃的前提。面对波兰,在德国先出现过优等文化,后来又出现的优等民族自豪感这一状况在国际层面得到了证实。在德国广大的阶层和民众中波兰人被看作是没有(建立)国家能力的民族,而法国文化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则是很熟悉的。人们对波兰文化采取的是不理睬,甚至是持否定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波兰共和国再次成立后,德国与波兰的冲突和矛盾更加激化。这一冲突最后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战后状况:在此次战争中波兰失去了500万人口,其中300万是犹太人。德国占领国推行了一种有系统地消灭波兰精英的政策,华沙被夷为平地。这个国家到处布满了集中营和灭绝营。德意志帝国在种族文化使命的名义下,渗和着贪婪,并带着对在第一次大战中失败后要报复的心态,对波兰民族实行种族清洗和奴役波兰人民的政策。如马伊达内克(Majdanek)、施图特霍夫(Stuttthof)和奥斯威辛(Auschwitz)这些地方,在波兰的民族集体记忆中体现了那些年波兰人的痛苦经历。每一个波兰人家庭在那些年,由于强制劳动、迫害及在集中营所遭迫害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当德国在二战中再次失败,来自德国的暴力又反射到德国自身。随着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撤退,对德意志东部地区民众来说开始了流亡和被驱逐的年代,有近1000万德国人背井离乡,或者被驱逐,或者是强制性被迁移到其他地区,在这一流亡过程中有将近数百万人死去。

在德国侵占波兰那几年内所积聚的一种仇恨此时被释放,最后落在了许多无辜者身上,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原关押波兰人的监狱和集中营现在又关进和挤满了所谓的叛逃者和德国侨胞。尽管这时的监狱决

不是用于消灭目的的灭绝营,尽管被关押的数字还没有达到纳粹时期的数字,但是人们不能将此看作是根据法制国家原则进行的事件。在战后许多年,波兰的许多人还认为驱逐德国人或德国侨胞是合理合法的。

战后所谓的“正常化”:二战后波兰人和德国人从来也没有像历史上出现过的这样不能相互理解。1950年前民主德国(东德)承认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并从官方层面宣传同波兰的友好关系,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德国同波兰敌对及不和解状态。对德波关系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也是一个重要的相关层面。这时的西德同波兰的关系,确切地说,二者之间的无关系状态是以战争的噩梦和东西方冲突、对峙的现实为特征的。这是一段相互回忆伤痛、互相指责的时期,而冷战又使得双方任何形式的接触更加困难。

在上世纪50年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政治生态由于出现经济奇迹、对历史的集体沉默,或者说自我怜悯和对战争的回忆而缺乏连续性。令人难以理解的自我公正性使许多人认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中德国人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此外,还有一种公开的报复心态,认为德国失去了东部地区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应该得到纠正。联邦政府坚持国际法所规定的立场,即在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代表国家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同波兰的边境问题只能悬置一边。因为,同波兰的关系问题是同德国的统一问题连在一起的。德国的这种观点在波兰并没得到人们的理解。没过几年,同样的德国人,在被毁坏的自家土地上,使本国经济、政治又很快强大起来,同时也向波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德波边境问题。德国要求波兰将边境问题先搁置起来不解决。而这一种观点在波兰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因为根据波兰人的战争经验,承认边境,就意味着承认波兰人的安全需求,承认边境这一点对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从波兰人来说,自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对分裂的感知和体验此次(二战)达到了高潮。而对德国而言,边境问题是一个国际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获得国家统一所需要的重要的政治保障,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但决不是生存的问题。

所以,德波关系的核心是边境问题。对波兰是安全问题,对德国是统一问题。这一情况所产生的关系不稳定性,一方面,波兰的共产党政府有系统地将它用于稳定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很轻松地指出,只有苏

联才是波兰生存的重要保障。存在于不可调和机制中的这种自我和外部形象,事实上影响了战后在欧洲存在着的东西方分裂和对峙。

二、和解之路

人们现在要问,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开始和解进程?其实有许多因素会与这种或那种形式,或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意义并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德国,第一步是重新获得话语能力。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对战后德国1945年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身处德国的我们,必须理性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我们仍然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我们正努力走到一起,我们要学会和别人交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希望阐述我们的观点,而且要倾听别人的想法。我们不止希望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且要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要倾听原委,要始终做好接受新观点的准备。我们要试图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当然我们要找出矛盾所在,解决矛盾要比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而引发无果而终的争论更为重要,以偏概全很容易,但做到理智思考就很困难。用鲁莽的言辞来打断交流是很容易的,要同时做到排除武断的想法并揭示事情的真相则是很难的。顽固地把持一个观点,并坚持直到无法进一步讨论是很容易的,但要一步步地前进,却不节外生枝是很困难的。我们重拾反思的意愿。这要求我们不能为傲慢、绝望、愤怒、倔强、仇恨以及轻蔑的情绪所左右,而是要将这些感觉冻结在心中,展示真实的一面。如果我们学会和他人交谈,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这样我们就有了必不可少的与他人交流的基础。对于每一个德国人而言,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要面对随之而来的失望情绪,要冒一败再败、受权威误导的风险。答案是这条路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将心灵从无赖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对于它的走向,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能够成功,那只能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的。”

理解/和解首先是在德国内部开始进行的,紧接着是德法之间的交流。这种理解导致了德国社会和社会各阶层开始承认波兰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从德国视角来看,主要涉及怎样摆脱自我怜悯,正视本国历史的事实。这一视角转换的诠释就是试图用别人的眼睛去看待自己本国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令人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是特别有效的。这一新局面的推动力来自于

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和1963-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在这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改变了联邦德国社会的自我社会认同,并通过年轻一代更加强化。虽然在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

这种对自我历史重新评判和审视的方式,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还是很有争议的。但这种方式直接引起人们对波兰西部边境的深思。

1965年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在文中他们建议放弃德国东部所失去的领土。纪念文发表后,在德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成为最后导致德波两国1970年签署《华沙条约》重要的动力之一。《华沙条约》表明了联邦德国放弃武力改变现存边境的立场。这方面的政治象征,或者说是标志性行为是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之举。这个下跪行为很清楚地表明了德波关系的根本转折。联邦德国社会开始承认波兰人民所受的痛苦,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罪责,并也由此拓开了认知别人的视角。通过这勇敢的一步,联邦德国走出了民族自负的束缚。

从国家层面,我们同波兰的关系要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教会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当然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朝圣”和前期德国人同波兰人的接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谁走出了这一步,谁就会放弃各种疑虑。而在这之前,面向波兰人、走向波兰人曾经在一段时期里被看成是一种背叛和一种共产主义的宣传。

除此之外,和解过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波兰主教在罗马会议结束时给德国主教写的那封信,信中他们伸出了和解之手,并请求宽恕,著名的句子是:“我们给予宽恕,并也请求宽恕”。这在德国和波兰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波兰主教说出了许多受害者难以接受的观点,即反人类的憎恨扭曲了人的特性。当时德国主教的答复比较迟缓。波兰内政状况又较为紧张,波兰主教陷入双方的激烈批评中,其中主要基调是:“我们不需要请求宽恕。德国人应该向我们走来,而不是我们走向德国人。”《华沙条约》的通过又为另一种对话和接触形式奠定了新的基础和十分有效的框

架,这个框架旨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项工作因团结工会日常生活的艰辛而中断。在1970年《华沙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大讨论和(下跪)象征性举动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接触、接近和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行动。真正和解正是在这时开始的。在和解过程中,接触、青年交流、德国人在奥斯威辛的公益劳动、建立共同的教材编写委员会、为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建立救助机构,以及为波兰受害者提供赔款等,这些方面的工作为和解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些只涉及小部分团体的工作,但这些团体所作出的贡献,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波兰受到人们的轻视。除了当时有利的政治气氛缓和外,正是这些持久不懈、有耐心的工作逐步为德波的接近和接触作出了明显的贡献。我们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相互协调和接触,使我们双方慢慢地得到改变。

接近和接触的过程使得那些造事者或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走出了自己的角色,从感情上讲这是一种相互疗伤,这对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与文化定势和扭曲的历史经验正好相反,人们感知一种真实的团结行为,这些小的象征性行为开始震撼历史上所形成的象征符号。

在1981年至1983年军事管制期间,这种真实的团结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军事管制实施期间,在联邦德国人们自发产生了同情波兰人和团结波兰人的大规模浪潮。数以万计的包裹寄往波兰,以缓解波兰人的灾难,这也使我们邻国的波兰人感到兴奋和惊讶。这说明,政治上宣布关系正常化是有价值的。在向波兰投寄包裹的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接触,并且在军事管制取消之后,这种接触又更加加深了。特别是青年的接触和交流以无声的方式化解了两国对峙的界墙和民族对峙的界墙。现在回想起最初要做到这种接触是多么的艰难和令人痛心。尽管对于历史角色、罪责、伤害等有不平等的分摊,但双方都对自我认同提出了异议。

这方面的成果也表现在1989/90年德国和波兰共同致力于欧盟的扩大以及系统推进波兰加入欧盟的过程。欧洲大厦共同的政治幻想是在数年中慢慢扩大的。从德国视角看,同法国开始的和解进程基本结束,同波兰的关系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人们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从波兰人的

脑海中驱散,这样人们就能在波兰赢得理解的空间,这也便于波兰反思本我历史当中的黑暗篇章。结果是波兰人成功地赢得了同乌克兰人和生活在波兰的少数民族的信任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当然德国人同波兰人原有的一种仇恨仍然很容易被激起并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影响日常的关系。

另外,人们不应该忽视到目前为止两个社会仍然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波兰加入欧盟后越来越明显。当德国和波兰在一些战略性问题明确之后,那些社会问题也就更加明显地浮出水面。但这些问题并不使人感到惊讶。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德波关系所存在的不对称性。与此相关的是在德国产生的一种倾向,即比较忽视波兰人的视角,而这在波兰又强化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解释模式。由此产生的怪圈隐藏着某些危险。在有被暴力侵犯经验和有屈辱历史的背景下容易产生一种能量,缓解和释放这种能量仍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努力。公民社会在进行社会对话过程中应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避免将历史作为政治化利用的工具。因为真实性和宣传性这两者之间是互不相容的。短时间里获得的好处会以长时间失去信任为代价,信任是对话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如果人们想从复杂的历史和解中去提取一些成功的要素作为其它和解进程中必要的要素,那么,在现有经历基础上,我们可以确定以下要素为和解基本元素:

1. 重新获得话语能力
2. 有勇气敢于承认罪过/ 罪行
3. 关心/ 团结幸存者
4. 尊重受害者
5. 定期进行接触
6. 有意愿审视自我,并以对方的视角看自己的历史
7. 在艰难的会谈中要有耐心
8. 在日常生活要有具体的团结行为
9. 有勇气进行回忆
10. 开拓一种具体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德波和解的个案显示,接触及和解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谁能想到经历过1945年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会做到这一点呢?这是一个有勇气的历史篇章。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俞仪方

DEUTSCHE INHALTSANGABE

Breite Perspektive für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Mei Zhaorong

Der 17. August ist der 34. Jahrestag der Aufnahme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m Rückblick auf den Entwicklungsprozess der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34 Jahren wird die Ansicht vertreten und auch dementsprechend ausgewertet, dass die reibungslose Entwick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Ländern durch ihre gemeinsamen Interessen bestimmt wird und über eine solid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 verfügt.

Versöhnung in der Nachkriegszeit von Deutschland mit seinen Nachbarländern

Frankreich und Polen am Beispiel der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Jörg Lürer/ Dai Qixiu (Übers.)

Bei der Erörterung der Versöhnung Deutschlands mit seinen Nachbarländern Frankreich und Polen nach dem 2. Weltkrieg analysiert der Verfasser schwerpunktmäßig den deutsch-polnischen Versöhnungsprozess und weist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beiden Vergleichsfällen auf. Auf dieser Grundlage zieht er von den historischen Erfahrungen und dem Versöhnungsprozess Schlussfolgerungen über die erforderli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die grundlegenden Elemente für die Versöhnung.

Kommentar zur EU-Politik der grenzüberschreitenden Kooperation

Wang Yamei

Grenzgebiete sind spezielle, aber wichtige Gebie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r Reduzierung des „Grenzeffekts“ und Ankurbelung der gemeinsamen Entwicklung bzw. Verschmelzung der Grenzgebiete hat die EU eine Reihe von Maßnahmen zur Förderung der grenzüberschreitenden Zusammenarbeit ergriffen. Mit Hilfe der EU haben die Grenzgebiete vielfältige wie auch erfolgreiche Zusammenarbeit entfaltet. Die grenzüberschreitende Zusammenarbeit, die die soziale und wirtschaftliche Konvergenz der EU sowie di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voranbringt, spielt eine wichtige Rolle beim Vollzug der Osterweiterung der EU.

Finanznot und Reform der EU nach der Erweiterung

Liu Yuebin

Am 1. Mai 2004 sind der EU 10 mittel- und osteuropäische Staaten bzw. Mittelmeerländer beigetreten, wodurch die Anzahl der EU-Mitgliedstaaten auf 25 gestiegen ist. Aufgrund des relativ großen Wirtschaftsgefälles zwischen